

老报人张西洛

汪东林



▲张西洛（1918—1998）

政协记忆

2023年是《人民政协报》创刊40周年，报社邀请我去口述报纸筹备和初创时期的情况，还刊登了好几篇我写的回忆文章。但事后仍感言犹未尽，于是单写老报人、人民政协报筹备和初创时期的实际主持人之一——张西洛老前辈二三事，其工作态度和精神兴许仍有不少参学作用。

“他可是一个热心人啊！”

我从1982年参与筹办和1983年创刊《人民政协报》，1995年调回全国政协机关，在报社连续工作十多年。当时的人民政协报从周一刊到周三刊（含周末版），发稿量和影响力都无法与今日相比。报纸的起点从一开始就是很高的，主要表现在：第一、办报的决定是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和中央统战部申报中宣部，又由中宣部申报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因此报头由时任第五届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题写；第二、在创刊5年左右时，报纸发行量从3万升至20万份，其中副刊和专稿都是约请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各界知名人士所撰写；第三、《人民政协报》首任总编辑萨空了，副总编辑徐亦安、张西洛，编委徐盈，全部是老报人，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就是知名记者、名编辑和主编。

本文要说的张西洛老前辈，在1939年就是赴延安专访毛泽东主席的《新民报》名记者。采访文章在当时的延安《新中华报》发表，新中国成立后，文章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注释中点出张西洛的大名。

1998年7月7日晚间，我在香港拜访84岁高龄的田一明（益民）委员，田老谈话的一开头便询问我1978年2月政协全国委员会五届一次会议的政协直属组委员现在还有哪几位健在。我扳着指头对他说：“仙逝居多，健在居少。”又一一列举了人名，最后说：“张西洛委员也不幸病逝了！”田老听了我的这句话，立即打断插话：“你说什么？张西洛去世了？什么病？”我回答说：“他是6月29日病逝的。张老因患膀胱癌多次住院，多次动手术。由于生性乐观，渡过了一次次难关。这次重病住院，癌症扩散，没法治了……”田老听罢长叹一声：“唉！张西洛是老记者、老统战，他可是一个热心人啊！”

田老的话虽是脱口而出，却是有感而发且恰如其分的。

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我是政协（特邀）分组的小组秘书之一。这个组的政协委员有几个特点：一是大部分人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贤达或在历史上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二是大部分人无党派，其生活供给关系在全国政协机关；三是大部分人都参加平时由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组织的政协直属小组

每周二至三次的学习。张西洛是当时少数与这三个特点无关的委员之一。但在全政协五届一次会议之后，张西洛立即成为经常出席会议的政协直属组的学习成员。

在1978年2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期间，张西洛是新委员，他的工作热情体现在方方面面。他十分了解政协直属组大多数委员的历史背景，在工作中他是能沟通组长、组员和小组秘书之间的人物。记者的职业特点十分突出，他脑勤、手勤、腿勤，信息灵通且乐于传播。由于他年纪较轻，在生活上十分勤快地照顾年长的委员，因此委员中有人戏称他是本组的“秘书长”。尤其是向上反映情况，凡需要委员出面且要求迅速，大家都公推张西洛，他从不推辞。

“十几个人、七八条枪”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年迈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老部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奠基人之一李维汉同志说，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他就想办一张宣传统一战线的报纸，始终未能实现，这个心愿现在怎么样，能不能实现？当时主持统战部 and 政协日常领导工作的刘澜涛很赞同他的建议，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正式组织、运作起来。彭友今、孙起孟、萨空了、聂真等老同志积极实施这件事。但在物色实际负责办报纸的人员时，当时政协机关有过办报经历的司局级的干部均表示难以承担这一重任。

张西洛得知政协要办报的消息，在政协直属组学习会上表示：“办报不难，只要领导重视，政协这么大的机关，给些人、给点钱，一张报纸就办起来了。现在的政协机关领导如彭友今、萨空了，有经验、有水平，由他们来主管，还能有多大的困难克服不了？如果需要我，我虽然年过花甲，身体尚健，很愿意为政协办报出力！”我作为小组秘书，立即将张西洛的意见反

映给聂真，他听了很高兴。事后得知，彭友今、萨空了都很熟悉张西洛，他们很快将此事报告刘澜涛，刘澜涛不日便找张西洛谈话，倾听他对政协办报的意见。

此后很快，张西洛便从《光明日报》调到政协，由于办报审批手续尚未完成，先请张西洛担任政协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当时实际酝酿筹办报纸的工作一直是政协学会办公室在进行，时任学会办公室的负责人宋德敏、朱真、傅随贤等先后操办。朱作霖、张一遵和我等人是学会办公室的干部，也具体参与过一些讨论、起草工作。

张西洛到任时，报名已确定为“人民政协报”（此前曾酝酿过另外几个报名如“协商时报”“民主论坛报”等），审批件已送到中央。张西洛工作抓得很具体，在编辑部人员组成方面，他首先点了在政协机关工作的4位同志名字，希望能调到编辑部参加筹备工作。实际上到了中央审批同意创办《人民政协报》、正式筹办两期试刊（1982年11月出版）时，张西洛只要到我一个人。但办试刊时，彭友今秘书长和萨空了副秘书长（兼人民政协报社总编辑）已从光明日报社调入徐亦安，徐亦安也是张西洛的老同事，二位被任命为人民政协报社副总编辑。

张西洛一直呼吁人手不够，全国政协机关从1982年新分配来的应届大学毕业生中要了一位同志。实际上《人民政协报》正式创刊前的两期试刊，就是由张西洛具体领导组稿和采访，我负责一至三版，另一同志负责四版副刊，徐亦安审编稿件并直接动手画大样。在1983年4月人民政协报正式创刊后，才陆续从外单位调入十多位同志，当时戏称“十几个人、七八条枪”。报社编委会组成，除了萨空了、徐亦安、张西洛，还增加了老报人徐盈。

“你看，我们的责任有多重啊！”

张西洛同志对报社工作人员的要求，是3句话：一是政治责任感，二是革

命事业心，三是“一个萝卜两个坑”。前两句话不用多解释，当然十分重要。这第三句话，不仅对当时报社人员太少有直接的针对性，而且包含着他认为报纸工作者应该是多面手，“能文能武”，报社人员应“少而精”的指导思想。

当时人民政协报创刊在即，我正忙于采写各种稿件，张西洛让我到北京市报刊发行局办刊号，他在交代我办理工作的细则后说：“报社就这几个人，还没有配备专事出版发行的人，你就放下手头的稿子，跑一趟吧。”

报刊发行局的一位副局长审视着我递给他的报纸审批复印件，他一边翻看报刊登记号的前几页一边说：“我们的刊号是插花着往外发的，30号之前，只有2号是空的，1号是人民日报，既然你们的报纸是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就不要放到30号之后去插花了，2号这个空了好好的位置就给你们吧！”我心里十分高兴。回报社我向张西洛交差，汇报了登记刊号的事情，他立即说：“你看人家多重视，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创办人民政协报，我们的责任有多重啊！”

值得一提的是报社领导层的团结合作。按照中央批示的精神，报社成立党组，萨空了同志任书记，徐亦安、徐盈同志是党组成员。报社编委会的组成，除了这三位，还有张西洛。报社实际上主持工作的是徐亦安和张西洛两人，因此他们的团结合作是报社工作运转通畅顺利的关键。

徐亦安和张西洛是老同事，但性格迥异，都有较强的个性，常常对有的问题发生争论，甚至彼此动了气。一开始，我极为这种情景担心，但不久就发现，今天争得面红耳赤，明天依然相互交谈，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争执一样。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两位老同志都一心一意地扑在报纸的工作上，没有自己的小算盘，从没有因为个人的得失而发生这样、那样的明争暗斗。

由于徐亦安、张西洛两位领导带了团结、合作的好头，当时报社下边的同志在这方面相互间的是是非非也大大减少。因为这，我同报社不少老同志一样，将长久怀念离开我们多年的徐亦安同志和张西洛同志。

张西洛同志是我在报纸工作上最早也是最直接的引路人和支持者，是我的好兄长和好老师。

（本文作者系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人民政协报》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文人逸事

竺可桢写日记

王剑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从留学哈佛时就开始写日记，57年从未间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竺可桢全集》共21卷，其中16卷是日记，共约900万字。

竺可桢的日记内容驳杂，涉及社会文化、气象地质、识才育人、抗战救国、科教兴国等诸多方面，而且记载非常详细，见人见事，成为后世了解当时历史状况的宝贵史料。例如，1936年8月11日，他从南京乘汽车返回浙江大学，一路盯着车上的里程表，测算着南京到杭州距离，连见到多少交通工具都记下来：“共见自行车七、驴三、运货车六、公共汽车八、小火车十二、包车四。”

每天记载天气、物候情况，是竺可桢日记的“必选动作”。天气如何、温度多少、风向湿度怎样，什么时间桃树开花了、柳树长出绿叶了、燕子从北方飞来了，他在日记中都有记录。作为一名气象学家，这不仅仅是他的日常琐记，也是他研究的数据来源。即使到了临终前一天，他依然用颤抖的手在病床写下最后一篇日记：“局报晴转多云，东风1-2级，最低-7℃，最高-1℃。”此时他已不

能到室外亲自观测温度，只好依据气象局的报告作了记录，还特意注上信息来源“局报”两字。

竺可桢日记有着论文般的严谨认真，不论是日记格式还是内容，均处处彰显着一丝不苟、求是求真的科学家精神。“求是”是竺可桢为浙江大学订立的校训，“只问是非，不计利害”是他对“求是”二字最精辟的解读。为了完成这种品格砥砺，竺可桢常常在日记里自省、检讨自己。有人写诗称赞竺可桢：

滴水欲穿石，万事需恒持。
问天孰能道？求是可为之。
日日家国计，科教救亡时。
物候常有变，君心未见移。

每当更换日记本时，竺可桢都会在扉页上抄录古诗词勉励自己。1965年5月7日，他抄录了陆游的七绝《冬夜读书示子聿》；1966年元旦又抄写了岳飞《满江红》中的词句。

《竺可桢日记》被史学界公认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名人日记之一”。2017年，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前夕，竺可桢家人向浙江大学捐赠了竺可桢存世的全部日记原件。

陶行知育儿

崔鹤同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培养孩子，从小就重视要动手劳动，不要做少爷、小姐，养成做人上人的苗子。他外出不在家写信时还要在信上叮嘱他的长子陶安、次子陶晓光：“桃红、小桃在家，自己的事要自己干。衣服要学洗，破了要学缝。烧菜弄饭都要学。还要扫地抹桌。有益的事都要做。”及长一些，他就要求他们向自助助人的方向去做。他在“儿子教学做之四个阶段”的诗里这样写道：

三餐喂得饱，个个喊宝宝。
小事认真干，零用自己赚。
全部衣食住，不靠别人助。
自活有余力，帮助人自立。

他觉得社会上对小孩的教育普遍只有两个阶段：一是全然依赖；二是忽然自立。这中间缺少明确渐进的桥梁。倘若成人突然发生变故，小孩失

其所依是多么痛苦呀！那时陶晓光才13岁，父亲就教他一面自学，一面写小稿子投稿；一面学英文，一面编译小的科普文章，这都可以赚些零用钱。

陶行知向孩子们推荐两位老师。第一位是自己的耳朵，文章写好了，先念给自己的耳朵听听，不顺耳的地方就要修改，念几遍，改几遍，到耳朵都喜欢听了才罢。第二位是老妈子。为此他有一首诗《问老妈子》：

文章好不好？要问老妈子。
老妈高兴听，可以卖稿子。
老妈听不懂，就算是废纸。
废纸哪个要？送给书呆子。

陶行知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有位“老师”替他改了好几篇文章，觉得比原来的好多了。他写的文章还常常要念给大人、小孩听，拜他们为师。他这样的言传身教，也给孩子们以良好的影响和熏陶。

马识途签字

顾燕

老作家马识途86岁时得了肾癌，医生的结论是：病情严重，必须立即进行手术，摘除坏肾，不然癌细胞转移，后果很严重。

一般高龄老人得癌症，医生和家人是不建议做手术的，怕老人吃不消。再说，癌症手术风险极大，极有可能躺上手术床之后就再也下不来。要做手术，就需要病人家属在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然而因为马识途的身份特殊，谁也不敢签字，谁也不愿意签字。

马识途自己想得开，他微笑着对主刀医生说：“人吃五谷生百病，没什么可怕的！医生同志，没人敢在我

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上签字，那就让我自己来签字吧。”医生一听，觉得这样也可行，接受了他的要求。

医生将手术知情同意书递上去，病床上的马识途颤巍巍地签了字。主治医生接过马识途签字的手术知情同意书之后，相互传开了，一看，大家都乐了。原来，马识途没有签自己的名字，他老人家写的是：“死马当活马医！”

主治医生感激地说：“感谢马老的信任，我们一定会尽心尽力做好手术。”手术很成功，通过休养，马识途的身体很快恢复了。

吴福桢识虫

周星

吴福桢是我国著名的农业昆虫学家，他一生为我国农业虫害防治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吴福桢从1959年起，用10年时间基本查清了农业昆虫的种类、分布及生活习性，还发现国内昆虫新种30个、世界新种8个。他在77岁那年，开始研究关于蟋蟀、螳螂的课题。由于这两种昆虫遍布全国，对农作物伤害非常严重，是人类的大敌。所以吴福桢争分夺秒地对这两种昆虫进行研究。

经过多年的努力，吴福桢收集到100多种蟋蟀、100多种螳螂，这些虫子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新疆到台湾都有。乍一看，它们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用放大镜一看，个体之间真是千差万别。以至于到后来，吴福桢能很快地根据蟋蟀身体的颜色、胸膛宽窄，辨别它们的战斗能力；从蟋蟀的叫声中，识别出它们属于哪一个种属。

汪曾祺读书

霍无非

年少的汪曾祺家中藏书不菲，他常常从尘封的书架上找到《岭表录异》和《岭外代答》两本老版书，看得津津有味，阅读的内容远超出他的年龄段。祖父见这个长孙如此好学，寄希望于他日后能出人头地，不顾年事已高，亲自给他讲解儒家经典《论语》，且隔天出一个题目，要他写文体叫“义”的作文，解释所学《论语》的内容，这对汪曾祺提高文论水准不无帮助。

汪曾祺对读书作文很有兴趣、不觉枯燥。上小学时，他的国文成绩很好，一直名列全班第一，时常得到老师好评，这当然离不开长辈和老师的悉心指导。中学时期，为避日寇扫荡，全家躲到乡下一个庵里，汪曾祺除了带数理化教材，还

带了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选集》两本文学书籍，反复阅读，领悟精髓，立志走文学创作之路。磨砺几十载，终成大家。他晚年回忆：“一个人能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事的语文教员很有关系。”

汪曾祺读书很杂，不局限于读古人诗词，文学书籍，而是广读博览，开阔视野。“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这是他的读书之道。他列举读杂书的种种好处：“第一，这是很好的休息；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第三，可以学习语言；第四，从杂书里，可以悟出一些写小说、写散文的道理，尤其是书论和画论。”像反映节令风物民俗的《荆楚岁时记》《东京

梦华录》，讲述草木虫鱼的《昆虫记》《植物名实图考》《花镜》，好看而不迂腐的学问著作《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以及书论、画论等，他都涉猎过。

汪曾祺买书很“吝啬”：他买书重内容、轻表皮，看重书的性价比。他热衷于买的是“一折八扣书”，用标价8%的实价，购得一本仅印白文、没有注释、几无标点的薄册子，像《断肠词》《板桥杂记》等笔记小说、旧诗词集和名人旧轶。买回家躺在床上，边吃粉盐豆边读，岂不快哉！

汪曾祺喜欢到旧书摊淘书。在上海，曾买过“和烂纸的价钱差不多”，却又值得纪念的地摊书《陶庵梦忆》《董解元西厢记》。他下放张家口沙岭子时，在镇上的新华书店意外发现《梦溪

笔谈》《容斋随笔》等古籍，如获至宝地按“不贵”的原价买下，挑灯夜读。他也归纳了廉价书的好处：“一是买得起，掏出钱时不肉痛；二是无须珍惜，可以随便在上面圈点批注；三是丢了就丢了，不心疼。”

汪曾祺最主要的书源是借阅。在西南联大中文系就读期间，好几个图书馆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有时伴着图书馆的窗外坟地“细乐”，通宵达旦阅读。同学之间传阅书刊，恩师更是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沈从文书架上古今中外，各种流派的文学书籍，他基本都借读过。以短篇小说见长的俄国作家契诃夫，是他最喜爱的作家之一，汪曾祺之所以写小说只写短篇，不写中长篇，不能不说其中有契诃夫的影响。

为什么读书？汪曾祺直言不讳：“是为了写作。”汪曾祺选择的职业，注定一辈子与书报脱不了干系，通过阅读借鉴，充实自己、了解信息、培养情趣，文、字、画、戏、烹都有涉及，路子越走越宽。可谓话到老、读到老、写到老。